

中国作为一个幅员广大、传统丰厚的国家，一个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有着自己极为特殊的境遇和经历、困难和问题，它的政治实践必然会体现出鲜明的特殊规律。

庄锡福 著

中国社会主义 政治文明建设特殊规律探究



厦门大学出版社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中国社会主义 政治文明建设特殊规律探究

庄锡福 著



厦门大学出版社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特殊规律探究/庄锡福著. —厦门:
厦门大学出版社, 2010. 11

ISBN 978-7-5615-3609-4

I. ①中… II. ①庄… III. ①社会主义政治学-研究-中国
IV. ①D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20697 号

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厦门市软件园二期望海路 39 号 邮编:361008)

<http://www.xmupress.com>

xmup @ public. xm. fj. cn

厦门集大印刷厂印刷

(地址:厦门市集美石鼓路 9 号 邮编:361021)

2010 年 1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89×1194 1/32 印张:8.5 插页:2

字数:230 千字

定价:20.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寄承印厂调换

目 录

绪论 中国政治的特殊性与社会主义

政治文明建设的特殊规律…………… (1)

第一节 中国传统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的特殊性…………… (2)

一、中国传统政治制度的特殊性…………… (3)

二、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特殊性…………… (7)

第二节 “被迫近代化”态势下的政治变革…………… (12)

一、被“拖入”的近代化与政治文化的西风东渐…………… (12)

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政治意蕴及其影响…………… (18)

三、“中学”“西学”之争及其历史启示…………… (21)

第三节 中国特色人民民主政治制度

和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确立…………… (23)

一、中国特色人民民主政治制度的来源…………… (23)

二、中国特色人民民主政治制度的基本特点…………… (26)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确立…………… (28)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基本特点…………… (30)

第四节 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

中国政治文明建设的特殊规律…………… (33)

一、如何理解中国政治文明建设的特殊规律…………… (33)

二、构成中国政治文明建设特殊规律的七大原理…………… (36)

第一章 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

各自地位及其相互关系 (50)

第一节 党的领导是实现三者有机统一的主导力量 (50)

一、党的领导是我国政治制度的首要原则 (52)

二、党的领导必须以人民当家作主为宗旨和目标 (57)

三、党的领导必须在依法治国的轨道上运行 (59)

第二节 人民当家作主是实现三者

有机统一的内在依据 (61)

一、人民当家作主是我国政治制度的根本目标 (62)

二、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 (64)

三、人民当家作主必须制度化、法治化 (67)

第三节 依法治国是实现三者有机统一的基本形式 (69)

一、依法治国是科学治国和民主治国的有机统一 (70)

二、依法治国必须坚持党的领导 (73)

三、依法治国必须以人民当家作主为目标 (76)

第二章 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实现党的领导的

科学化、民主化和法治化 (78)

第一节 彻底实现我党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 (78)

一、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极端必要 (78)

二、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根本标志 (80)

三、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曲折历程 (89)

第二节 加快实现我党领导方式

和执政方式的转型 (94)

一、问题的提出:党的领导方式

和执政方式之关系的历史考察 (94)

二、正确理解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 (97)

三、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和依法执政基本方式的

提出推动了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转型 (99)

第三节 制服腐败:攻克政治体系的癌症	(103)
一、能否制服腐败关系党的生死存亡	(103)
二、腐败势头未能根本扭转的原因	(104)
三、反腐败的机制构建	(107)
第四节 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	
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最优路径	(115)
一、推进党的领导的民主化	(115)
二、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成本最低、 效果最好的政治选择	(124)
第三章 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	
开拓政治文明的新境界	(127)
第一节 人民民主是我国政治制度的根本原则	(127)
一、人民当家作主是我国政治制度设计的 出发点和落脚点	(127)
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国一切政治机构的 唯一宗旨和制度伦理	(130)
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国所有公务人员的 最高准则和工作伦理	(132)
四、当家作主是我国全体公民的根本权利	(134)
第二节 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挖掘我国政治制度的 丰富民主内涵,充分发挥我国人民民主制度的 巨大优越性	(137)
一、改革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137)
二、改革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142)
三、改革和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 与政治协商制度	(146)
四、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一国两制”的政治形式	(149)
五、加快推进社区民主和基层自治	(152)

六、着力培育、引导、规范社会组织的自主发展	(155)
第三节 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两个关键环节	(158)
一、官由民选	(158)
二、财经民理	(162)
第四章 加快推进依法治国的进程，	
实现法治国家的伟大目标	(167)
第一节 依法治国的真义	(167)
一、依法治国的实质是法治国	(168)
二、依法治国的目标是法治国家	(173)
三、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	(183)
第二节 加快推进依法治国的进程，	
实现法治国家的伟大目标	(191)
一、依法立法	(191)
二、依法行政	(201)
三、依法司法	(213)
四、建设法治国家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历史使命	(221)
第五章 中国特色政治文明的世界意义	(230)
第一节 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	(230)
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何以可能	(230)
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基本框架	(234)
三、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政治之维	(237)
第二节 中国特色政治文明的世界意义	(243)
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比其他模式更具普遍意义	(243)
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世界的希望	(255)
后记	(263)

绪论 中国政治的特殊性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特殊规律

政治文明,《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卷定义为,“人们改造社会所获得政治成果的总和。一般表现为人们在一定的社会形态中关于民主、自由、平等、解放的实现程度。”据此,我们应从如下方面理解“政治文明”的内涵,其一,政治文明是一个历史与现实交融的概念,是对人类历史演进和现实发展中政治生活方面的创造性成果的总括;其二,政治文明是一个规范性与实践性互摄的概念,反映的是人类对政治生活中的价值、标准和理想的判断和追求。其三,政治文明又是一个普遍与特殊相统一的概念。不但历时的各社会形态的政治文明有普遍与特殊的问题,而且同时的各民族国家的政治文明也有普遍与特殊的问题。而本书着重阐述的,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特殊规律。为此,我们一方面必须从全部人类政治文明史的角度把握政治文明的普遍规律;另一方面,则要着重发掘我国政治文明的特殊规律,从我国传统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的特殊性、“被迫近代化”态势下的政治变革的特殊性等方面,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当前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现实条件和背景的特殊性上着手研究。

第一节 中国传统政治制度 和政治文化的特殊性

对世界史进行研究,我们可以确知,比较其他文明实体,古代中国是一个更为相对独立的文明单元。中华民族在东方这片神秘而肥沃的土地上充分发展着自身的智慧,形成了特有的民族文化气质,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明,维持着高度发展,并在进入近代之前都领先于世界水平。就政治文明而言,无论是传统政治制度和实践层面,还是作为价值取向的传统政治文化精神层面,都具有显著的特色和比较优势。18世纪欧洲的启蒙思想家们正是从中国政治文化中找到了批判欧洲中世纪传统的思想武器^①。所以,面对古人给我们留下来的精神宝藏,我们要好好发掘。当然,我们也不能全盘接受,而应该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对传统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剔除其封建性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精华”^②,以顺应政治现代化的需要。

钱穆对中国传统政治制度就特别推崇,他认为,“西方人在政治经验上都还比较短浅。……中国政治比西方先进步,这是历史事实,不是民族夸大”^③。钱先生特别重视中国政治制度的特殊性,他在《中国历史精神》第二讲中谈到:“中国政治将来的新出路,决不全是美国式,也决不全是苏俄式,跟在人家后面跑,永远不会有出路。我们定要能采取各国之长,配合自己国家实情,创造出一

① 葛荃:《中国政治文化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导言。

② 《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98页。

③ 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77页。

个适合于中国自己理论的政治。”^①这种看法,无疑是十分深刻的。从某种意义上,这种政治文化的特殊性,也是民族所以自存的根本。而民族要在后续发展中,离开这种特殊性去寻求政治文明上的自觉自新,也只能是奢谈。事实上,在政治现代化的途中,我们取得的任何一点成就,无论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政治,还是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政治和社会主义政治,或是邓小平改革开放以来逐步完善起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都是立足于中国政治实践,结合古今中外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的优秀成果的综合创造,富有中国的鲜明特色。

一、中国传统政治制度的特殊性

由于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状况与社会结构并不相同,其历史地理条件与民族的传统文化习俗也各有差异,因此,即便同一类型国家的政治制度也往往各具特色。这种特色,是政治制度共同发展规律的特殊表现形式。

古代中国的政制特色就是统一、专制和集权^②。学者们认为此政制起于秦。清人恽敬曾经说过:“自秦以后,朝野上下,所行者皆秦制也。”^③20世纪初,著名历史学家夏曾佑在其所著《中国古代史》中也说:“中国之政,得秦皇而后行”,“自秦以来,垂二千年。虽百王代兴,时有改革,然观其大义,不甚悬殊”。^④恽敬和夏曾佑所说的“秦制”,即统一的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也就是我们习惯上

① 陈勇:《钱穆传》,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62页。

② 注:在这里,我们不宜拿今人的境界要求古人,所以也不宜对专制和集权的意义做一般的褒贬。

③ 白钢:《中国政治制度通史》,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5页。

④ 夏曾佑:《中国古代史下册》,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25页。

所说的传统政制。姑且不论其利弊,这里有几点可以澄清,其一,统一是主流没错,但我们也不能看到分立——大概占整个古代历史的三分之一时期,对政制发展的意义;其二,也不能简单地说这种政制起于秦,只能说成熟形态在秦代。

这确实是中国历史和西欧历史方向发展的一个重大分野,但绝非偶然。中国政制的这种品性是由特定的地理环境影响的^①。黄仁宇先生认为,“易于耕种的纤细黄土、能带来丰沛雨量的季候风和始而润泽大地、始而泛滥成灾的黄河,是影响中国命运的三大因素。它们直接或间接地促使中国要采取中央集权式的、农业形态的官僚体系”^②。

1. 以君主专制为核心的大一统政治体系

君主专制始终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政治制度。在几千年政治发展过程中,中央集权制的君主专制不仅没受到根本的触动和变革,而且是沿着螺旋式上升的轨迹被不断强化的。王朝的更替使以君主专制为核心的中央集权化得以不断完善和发展,到明清时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造成君主专制的恶性发展。需要说明的是,君主专制政体作为封建制国家最主要的政权组织形式,世界上许多封建制国家也曾实行过。但是,中国的君主专制政体,却与西方一些国家的君主专制政体大不相同。西欧一些国家的君主专制政体,是在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时期,为适应资本原始积累的需要,在封建等级君主制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它的建立与发展,导致了西欧封建制度的解体和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而中国封建君主专制政体,则是从奴隶社会的等级君主制转化而来的,它与资本原始积累毫无关系。它的确立与发展,起到了巩固封建经济基础的作用,并没有把封建的中国引渡到资本主义。因

① 许倬云:《中国古代文化的特质》,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19页。

② 黄仁宇:《中国大历史》,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21页。

此,我们讲君主专制主义是中国传统政治制度的特殊性之一。

中国君主专制主义在政治制度上的表现有二:第一是帝位终身制与皇统世袭制;第二是皇权没有约束,皇权不受监督。秦始皇确立了“命为制,令为诏”,“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的专制主义原则,集国家最高权力——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于一身,从而赋予君主制以个人独裁型。

2. 宗法制度是重要的传统政治制度

所谓的宗法制度,就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以远近亲疏为标准,标榜尊崇共同的祖先,区分尊卑长幼,规定继承秩序,确定宗族成员不同的权利和义务的法则。

总的来看,宗法制度的主要特征首先是宗法家族血缘关系。无论是史前时期,还是文明时期的宗法制度或家族制度,始终保持着人类最原始的血缘关系,而且从未中断过。吕思勉认为“古代天子诸侯间之关系,实系宗族之关系”。^①宗族关系就是血缘关系的一种表现形式。血缘关系与政治关系是合二而一的。其次是家国同构。家是国的基础,国是家的扩大。在这种制度下,“国家”是以帝王为家长的大家庭,国家大事无非是皇帝的家务事;政府有权干预任何家庭琐事和个人私事。这样一整套复杂而又严密的宗法血缘关系,本身又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统治模式。再次是专制权力——君权父权至上。在宗法家族社会,一家之长的权力和地位是最高的,一国之君的权力和地位是至高无上的、唯一的,超越了法律以及其他的所有权力。君权就是法律,而父权受到法律的维护,没有其他的力量能够撼动。其他所有的权力和权利都源于君权与父权,因此,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君权与父权。必须说明的是,国家宗法制度与家族宗法制度是有原则区别的,前者是一种国家政治制度,后者则是一种血缘社会制度。两者紧密结合,从而

^① 吕思勉:《中国制度史》[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73页。

“家国同构”只是在西周时代。经过春秋战国的社会大变革,秦建立的大一统专制政权实行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国家宗法制度基本退出历史舞台,但家族宗法制度却顽强地保留下来,成为影响中国社会结构乃至国家治理方式的重要因素。

3. 儒家学说是传统政治制度的思想基础

考察中国传统政治发展历程,不能忽略儒家思想的作用。自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在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儒家学说一直是占统治地位的政治意识形态。儒家文化因为与国家政权的结合,不仅使其长期占据着传统政治思想的正统地位,成为君主专制政权制定各项具体制度和政策的依据。更重要的是,儒家思想经过长期的发展,逐渐成为支撑中国传统政治制度的重要的深层思想结构,成为历朝历代专制君主统治的合法性的主要理论依据。并且,经过长时间的儒家政治文化的教化,这套思想逐渐成为整个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念,由不断强化而逐步内化成为人们行为选择的重要思想依据,甚至成为人们的一种自觉追求。意识形态控制和社会教化相结合,儒家思想不但成为传统政治文化的核心,而且逐渐沉淀为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于是,对儒家思想的认同成了对传统政治制度的认同,这也成了中国传统政治形态的一大特色。

当然,统治阶级也不是纯用儒学,实际上是儒法并用、外儒内法。政治作为阶级统治的工具,其所依靠的首先是暴力强制,而这一方面恰恰是儒学经常批评法家学派的;相反,法家对儒家宣扬仁义道德极不以为然,他们讲求的是尚法任刑、挟势使术。对统治阶级来说,这两手都不能没有,而应该恩威并用、“霸王道杂之”。鉴于秦始皇专用法家学说二世而亡的教训,后世帝王不得不看到,一味强调刑罚只会激起民众的不满和反抗,看到儒家仁政学说对于长治久安的重要性,特别是其粉饰暴力统治对于麻痹被剥削阶级的重要作用。因此秦以后的历代统治者总是大力宣扬崇儒尊孔,

“以孝治天下”。儒学备受推崇而并不完全实行,法家学说未见宣扬却被实际使用。这就是历代统治思想的实际情况。

4. 人治是传统政治制度的主要运行方式

中国传统政治是一种人治政治,主张为政在人。孔子认为“文武之治,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法固然不可缺,但“徒法不可以自行”,执政者“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行”,其为政道德起着更根本的作用,因此“有治人无治法”。因而要求君主以身作则,施德行仁,并尚贤使能,任用得力官吏推行礼治,把人治与礼治、德政结合起来。由此看来,儒家的“人治”是一种贤人政治,实质就是德治。战国儒家“人治”和法家“法治”之争,焦点并不在承认不承认“人”和“法”在政治实践中的作用,两者在现实政治中显然都是不可缺少的。两者争论的焦点在于:儒家认为政治的关键是为政者的道德水平,即能否“施仁政”,行“不忍人之政”。法家则认为政治的关键是执政者能否制定并推行举国一致服从的“法”。(最极端的法家认为仁义道德不但无用,而且足以阻碍法的推行。但战国以后的法家学派一般都肯定道德教化也不能缺少。)

基于以上讨论,我们可以把传统中国政治制度的特殊性概括为:以君主专制为核心的大一统政治体系,“外儒内法”的统治思想和政治策略,在儒家学说基础上以“德治”为鲜明特征的“人治”治理模式。传统中国所创造的这种政治制度别具一格,有独特的民族性格与文化个性,值得认真地加以总结并吸取其经验教训。

二、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特殊性

政治文化与政治制度的关系,颇有点类似于软件与硬件的关系。首先,政治文化对确立政治制度的结构、性质和形式具有重要影响,是政治制度赖以生存的环境的有机组成部分,政治文化的变

化必然导致政治制度的变化,政治文化没有改革而强行进行政治制度的变革会导致它无法正常运行;其次,政治制度是政治文化的物化形态,政治制度的变革也会引起政治文化的变化。其次,政治文化与政治制度是相互影响的。尽管不同步,但政治文化的变化必然导致政治制度的变化,而政治制度的变革最终也会引起政治文化的变化。

在一个国家中,当政治制度与政治文化相适应时,政治体系就稳定;反之,当政治制度与政治文化出现隔阂,不能相互适应时,政治体系就会动荡不安,政治秩序就会陷入混乱。因此,深入剖析传统政治文化的内在结构,科学理解政治文化在政治稳定中的基础作用,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 also 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曾以高度发达、高度稳定闻名于世,以下我们探讨它的基本形态。

1. 德仁——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观念

中国儒家的政治思想主张依靠道德高尚的圣贤通过道德感化来治理国家。儒家的主要经典、“四书”的第一篇《大学》完整地阐述了这一治国理念。其开篇云:“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这就是所谓“三纲领”。而实施“三纲领”有八个步骤,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就是所谓“八条目”。又强调“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可见儒家非常重视个人道德,尤其认为帝王必须从格物致知做起,修成高尚的品德以治国平天下。孔子认为:“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①。又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

^① 梁知注评:《论语·宪问篇》[M],暨南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 卷第 168 页。

星拱之。”^①中国古代社会,国家政治结构上的家国同构,社会关系结构以伦理关系为基础,使人们道德观念的形成、道德教育的理论和实践与人们的行为密切联系在一起。无论是君主还是臣民,都要追求道德人格的完善。“身国共治”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一大特色。

儒家主张用“仁”的思想协调人际关系,实行“忠恕之道”,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②简言之,孔子“仁”的思想,要求由主体自我做起,树立主体性道德人格,贯穿着爱人而人人互爱的精神,肯定了个体和类主体的地位、作用、价值的独立性、尊严性。

2. 礼治——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旋律”

儒家的“礼治”的根本含义为“异”,即使贵贱、尊卑、长幼各有其特殊的行为规范。这就要求社会上各色人等首先要明白各自的身份地位,进而明白各种身份地位应有的行为规范,然后按照贵贱、尊卑、长幼、亲疏之别各安其分、各遵其礼,才能达到儒家心目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的理想社会。礼治对政治文化有重大影响。可见礼是关于社会生活的具体制度、规范和准则仪式,包括社会政治制度和伦理道德规范,是维护宗法主义的等级秩序、治国安邦的根本,其功能在于处理国与国之间、君与臣之间、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其基本精神是“礼让”,以便从根本上消弥人与人之间的争夺,理顺社会中的各种纵向、横向关系,维护社会的和谐。

3. 民本——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根本出发点

“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根本出发点就是‘民本君主’,即把政治

① 梁知注评:《论语·为政篇》[M],暨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卷第12页。

② 《论语·雍也》

体看作是君王和臣民这两个部分组成的统一整体,君王和臣民作为整个政治体的组成要素,它们密不可分。”^①民本思想的实质是从政治体制中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入手,以君权统治的稳定性为目的前提,以维护统治者的利益为核心,主张重民、从民、爱民,最终优化封建统治秩序,保持政权的长治久安。孟子说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只不过是思想家的向往,不可能是封建社会的实际情况。实际情况是:“重民”也好,“民本”也好,最终都是为了维护君主的统治,“民本”只是宣传,是表面现象,“君主”才是实质。实际上,在长期的封建社会,广大“臣民”在长期的“教化”之下,一般也是把忠君作为最根本、最重要的政治品格。

4. 中庸——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主要思维方法

“中庸”这个概念是由孔子提出来的:“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②孔子是在慨叹中庸作为最高处事原则当时已经很少人可以做到了。可见所谓中庸之德不是指品德、品质,而是指对待事物的态度,所以后来一般又称为中庸之道。“中”的主要含义是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庸”的含义有平常、常道、常行等义。中庸即是将适度而不走极端作为日常生活所常行的不易准则。践履中庸之道,必须反对过分、不足、偏执某一方面,防止走极端,把握言论和行为的度。但这并不意味着折衷主义、无原则的和稀泥,相反,中庸反对机械的“执中无权”,而是主张“执中用权”。这种用全面、稳健的方式来处事是一种很高的智慧,包含着对“物极必反”辩证原理的深刻体认。中庸之道内在地要求将诸如文武、刚柔、张弛等对立的两极统一起来,将两种相异或相反的品格结合起来。

① 俞可平:《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论要》[A]。马德普:《中西政治文化论丛》,第一辑[C],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② 《论语·雍也》